



醒来在人间

○陈利娟

最近在读美国作家玛丽莲·弗伦奇的作品《醒来的女性》，这是一部反映了整整一代美国女性生存境遇的小说。讲述了女主米拉和她的家人朋友们在人生四部曲——成长、婚姻、重新选择生活、完成自我选择的挣扎过程，给所有童话故事里男女主婚后生活留白的地方续上了真实。

书的一开始，就让人感到窒息。女主米拉将青春献给了柴米油盐，人到中年却被离婚。拖着有些停滞的灵魂，她被迫去面对外面新的生活，从体面的太太，一下子跌落成了孤零零的“怨妇”。

米拉的前半生，是高开低走的，她十四岁读尼采和潘恩，开学第一天就学完了全部课本。这样一个聪慧的女孩，本该拥有大放光彩的人生，但在大家认同人生主题是“家庭”的社会状态里，婚前她只得从事一份无趣、不喜的工作，按时领着工资，一丝不苟地穿着紧身塔生活着。也试图反抗过，但家庭的施压和社会目光的蚕食让她屈服了。结婚后米拉被迫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要全权打理一个家庭，生活费的获取全凭丈夫的心情，而且不受劳动法保护，她的丈夫还说那一切都是女人应该做的，凶恶地对着她指手画脚。

米拉在婚姻上的痛苦，让我想起了我

的表姨、堂姐、朋友。我身边很多人仿佛都和书里的悲剧人物对上了号。我的表姨是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她一开始和米拉一样，屈服并带了点对未知生活的向往，婚后和丈夫在地里侍弄庄稼，回家张罗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但公婆和丈夫的打骂冷暴力是常有的事情，不被尊重、得不到平等的痛苦撕扯着这个受传统思维熏陶的女性——凑合过日子的思想蛰伏了几十年，直到孙子都五六岁，丈夫还在因为婆媳间的拌嘴试图抽下皮带来打她，她才彻底崩溃。

离婚后，米拉去看望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朋友莉莉，莉莉说起病友伊内兹的“怪癖”，她喜欢昆虫，她总在观察它们。她过去在家时经常读有关昆虫的书，可她老公觉得那是有病。她不洗地毯，也不洗碗，只是一味地读关于昆虫的书。精神科医生和她老公的看法一致，他们觉得不能再让她这么疯下去，所以，他们什么书都不准她碰。可她还是会观察昆虫！

米拉思考，审视自己的生活，“那些女人太把男人当回事了……她们把决定自己身份和价值、认可或否定自己的权力都交到了男人手中。她们已经没有自我了”。米拉是一个拥有醒来潜质的女性，这种潜质在两性关系里，被视为最不应该存在的危机。她们会在痛苦后选择再次进入校园学习，交朋友，又拥有了爱情但不被捆绑，尽可能自由地生活着。

虽然醒来的代价是踏上满目疮痍的现实生活，但这是一种惊喜，思考是让灵魂得以恢复独立安放的最佳方式。那些在精神病院的女人是醒来的，那些在大学里的女人也是醒来的，我的表姨也是醒来的，她终于在已经显老态的中年，在和丈夫大吵一架之后，去了外地打工，不再用在男人村庄土地里刨的钱过活，她说，“原来除了丈夫，别人都会平等地对待我，我工作，就有钱拿，少一分，劳动法都会保护我。等到我摊开双手，自己挣钱，还能贴补子女，他才觉得我也是和他一样的人。”

如何获得平等，如何追求自由，怎么让自己完全独立——这些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是千百年来女性痛苦的根源。追根究底，是两性的较量从来没有以平等的局面出现过。不平等的一切情感状态，仿佛就是给了别人践踏自己的机会。完成自我抉择后，才能明白，别人的目光和评价就像夜宵时的一块蛋糕一样，不过一份吃食而已，都是琐事一桩。只有醒来，让那些人知道我们醒来了，才是真的在人间。

苔花之姿 牡丹之志

○余宋庆

清朝有个个性独特的诗人叫袁枚，乾隆十四年，他辞官隐居南京小仓山随园，世称“随园先生”。在此期间，他收了很多女弟子，反对纲常名教对于女子的压迫，鼓励女子诗文创造。乾隆年间妇女文学的发展，袁枚功不可没。

当然在封建礼教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当时，袁枚的种种“出格”的事招致了非议和指责，说他“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但袁枚不在乎，提笔写下《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于细微处见真知，他在女性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本能和生存意向——看似弱小也不会因为环境恶劣而丧失生发的勇气，而是创造旺盛的生命力，凭着坚强的活力，突破环境的重重窒碍，焕发属于自己的光彩。

也许袁枚并不知道他为中国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点燃了星星之火。是教育让女性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生发自我觉醒意识。是知识给了女性新的思想和观念，让女性有勇气突破自己，跳出樊笼和禁锢，敢于对现有的社会体制提出更多的要求，争取更多的权益。二十世纪初的清末，“闻风而动”的多为知识女性，她们筹款兴办女子学堂，创办妇女刊物，宣传妇女解放，争取性别平等，用新思想启迪同胞姐妹们共同斗争。她们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时代的浪潮浩浩荡荡，不断更迭的社会意识给新时代注入了新的活力。新时代的女性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她们在职业和生活中都有了更多元化的选择，在社会体制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可以在各自的岗位建功立业，巾帼不让须眉，撑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的余毒是种顽疾，会在某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和某些人的心里反反复复发作，重男轻女、三从四德的两性价值观根深蒂固。有些地方的有些人家宁愿砸锅卖铁供成绩不好的儿子读书，也不愿意花钱供成绩好的女儿读书。女孩们没得读书，有的甚至被早早嫁人拿回彩礼补贴家里。女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有走进学堂，用知识武装自己。从这个角度上说，张桂梅校长和她的华坪女子高中的存在具有时代意义。在张桂梅的不懈努力下，她为1645名适龄贫困女孩圆了大学梦，她们从这里走进大学，从大学走向社会，走上不同的岗位去实现理想，追求梦想。后来，她们中间的很多人又怀着感恩的心支持母校，捐钱捐物，有的甚至放弃正式的编制来母校当一名代课老师，继续传承、发扬张桂梅老师无私奉献的教育理念和精神。

无论是猖狂的袁枚，还是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张桂梅，她们对女性的教育为女性打开了扇门，让这个群体焕发着自己的生命之光。她们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意识，她们自尊、自爱，自强不息。尽管她们的成长之路可能布满荆棘，但她们终将冲破重重阻碍实现自我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她们不再是柔弱的象征，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更是在不同层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柔肩担重任，巾帼绽芳华。”新时代的女性更应该追求平等、自由、强调独立、自信，不受家庭、婚姻的束缚，追求幸福，勇于做自己。即使如米粒般微小，也要像苔藓一样开自己的花，用自信照亮自己，集微光照亮世界。



真正的美 源于同命运的抗争

——浅谈《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性观

○李芹

最近，改编自张爱玲著作的电影《第一炉香》上映，而被网友广泛接受的“第一炉钢”的评论虽是针对演员外形的戏谑之言，却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形象（至少是一部分女性形象）作为“被窥视者”的存在，也就是波伏娃所指的“两性”。显然，这与张爱玲创作这些女性形象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计其数，形象各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她们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真人，不同于道德模板一样的贞洁烈女。“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对于美是执着的，无论是对环境的梦幻般的描写，抑或是对女性人物的细节点缀，无不体现出她对人生中少有的美感的几乎疯狂的搜寻。哪怕是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无法言语的深切痛感，她还是能隔着那些令人搔痒的“虱子”，触摸到人生中如绸缎般的柔软。这样的张爱玲又怎么会令她笔下的女性仅停留在愉悦读者的表面上呢？

张爱玲所讴歌的美是深刻的美，是一种敢于同命运抗争的悲剧性的美。葛薇龙是美的，但当你用现代流行审美中的“白富美”去衡量她的美时，你已然错过了她真正的美。“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颤的美人是糖醋排骨，那么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这是葛薇龙对自己的印象，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葛薇龙非常符合这样的描述，她皮肤白皙，又是娇养的，定然不至于瘦弱，所以她是肤白略胖的，哪怕将她的理解为“壮实”也并不过分。

然而这外貌并不是张爱玲的关注点，因为张爱玲所关注的美从来不是外表，而是那种力透纸背的悲壮美。葛薇龙那种因为被乔琪忽视而激发的异于常人的力量最为吸引作者，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最初，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吸引力，但是后来，完全是为了他不爱她的缘故”，这是一种近乎偏激的不合常理的爆发，甚至不被大众所理解，可是真正的女性不正是这样极易冲动的吗？她用她的方法养着他、纵容着他，这种爱更近似母爱，而她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妓女。“我与她们是有区别的，她们是不甘愿的，而我甘愿”。葛薇龙的悲剧源于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被赋予爱一个人的能力。而她想冲破这命运，可注定是飞蛾扑火。这是葛薇龙的无奈，更是同样作为女人的张爱玲对男权的无声控诉。

尽管《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弥漫着市侩的颓废和忧郁，可当我们拨开这些氤氲在文字中的雾气，那些由于与命运抗争而头破血流的女性形象都熠熠生辉；少女时期的葛薇龙、梁太太、睇睇……都散发着一种女性独有的美，那种美是自信的、有生机的，而最终也是归于消亡的。

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指出，在男权影响下，女性一直处于被言说、被塑造的地位；不仅如此，女性作家也碍于“舆论羞耻”，没有办法塑造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女性形象。在上世纪40年代这个风雨飘摇的背景下，张爱玲敢于将生活中最真实的女性形象搬上历史舞台，这本身就是女性的一大进步。而她作品中洋溢着的敢于打破命运枷锁的女性悲剧美，在中国文学历史中树起了象征女性力量的旗帜。

读书札记

飘零而执着的人生之舟

○孙克艳

创作于2005年的《生死疲劳》，是莫言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用莫言的话说，诺奖的评委主要是因为读完了这本书，才把这个殊荣授予了他。

《生死疲劳》讲述一个冤死的地主西门闹，在历经了六道轮回，依次投胎为驴、牛、猪、狗、猴和一个带着先天缺憾的大头婴儿的故事。故事主要以动物们的独特视角，来体悟和审视1950年到2000年的这几十年间，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浪潮下，一个叫作高密的乡村，又一次发生着的变迁与改革。而引发这一次次社会变革的主要内容，便是土地这个沉重却不可逾越的具体事物。通过对几代人典型人物的刻画，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汹涌澎湃的社会变革，和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执着和坚守，以及中国式农民的朴实、勤劳与坚韧。

这是一部具有浓烈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巨著。然而这种独特的风格，却又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者深受影响的乡土文化相融合。诸如作为本书主线的“六道轮回”，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穿插引用，和具有浓烈地域特色的方言，都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另外，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更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致敬与发扬。总之在风格上，这是一本具有中国特质的“百年孤独”。

“突然降临的大喜事，像一扇沉重的磨盘，几乎粉碎了我的身体。”

“有些狗，变成了人的宠物；有的狗，把人变成了宠物。”

“当年许多神圣的掉脑袋的事情，今天看起来狗屁不是。”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林子小了，许多鸟就没有。”

“在子弹击碎表壳的瞬间，数字分崩离析，时间成为碎片。”

“这是一个让人痛并快乐着的故事，这是一本让人笑中带泪的书。如果你觉得自己过于浮躁，如果你觉得当前的生活过于乏味或沉重，那么就用心品味它吧，它会慰藉你此生的失意，抚平那些过往的悲辛。读完它，捧着它，大概会引发你一声叹息。而那些令人纠结的不快，便随着那一声叹息，烟消云散了。如此，我们便继续轻装上阵，在人生的大海中如一叶扁舟，飘零而执着地行驶。”

读书笔记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读纳兰性德《饮水词》词集

○赵冰琰

纳兰性德，字容若，一位生在王宫贵胄之家，却悠然尘外的词人。有很多人将纳兰词中的“一生一代一双人”奉为爱情的圭臬，同时也对纳兰不能与心爱之人厮守到白头的结局唏嘘不已。

翻开《饮水词》，步入他的故事，一段“若只如初见”的开始，以及“秋风悲画扇”的结尾，让人感慨。纳兰容若这一生，自始至终都在追寻爱情。

人生若只如初见

很多人说，纳兰容若是贾宝玉的原型，但纳兰与表妹的故事，似乎比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故事更加凄婉一些。

二人相逢的那一年，纳兰应是在七岁。表妹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而投奔纳兰府。从此二人朝夕相对，磨墨写词，读诗相和，在懵懂年岁，情丝暗长。

“一梦芙蓉着秋雨”“小晕红潮，斜溜囊心只凤翫”，是纳兰笔下羞涩的表妹。衣香鬓影，令他心牵，但是“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表妹的若即若离也令纳兰心生愁绪，满腔爱慕之情也无处诉说。

二人之间身份的悬殊还是给这段感情带来了不幸，表妹被送进宫选秀。“知道今生那见卿”“不信相思浑不解”，这段感情随着表妹的入宫就此夭折，葬在纳兰的心底，连同表妹绣的并蒂莲，也一并藏在记忆最深处。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总是对初见有种种眷恋，多想留住最初的记忆，多想留在最纯真的年纪。初恋，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一点朱砂，滴在心头，那么小小一滴，却是惊艳动人。要是总能有初见般的心动，天下的有情人总会跨越重重阻碍，终成眷属的吧？

一片伤心画不成

二十岁这一年，康熙将十七岁的卢氏赐婚与他。妻子的温柔渐渐让纳兰从失去表妹的沉痛中解脱出来，从此鹣鲽情深、鸾凤和鸣。

就算远在塞外，他也一直思念着妻子，“书郑重，恨分明，天将愁味酿多情”“一种晚寒残梦，凄凉毕竟因谁”“握手西风泪不干，年来多在别离间”。



红色书屋 共享共建

近日，位于绍兴柯桥区柯岩街道高尔夫社区举行“初心驿站”红色共享书屋图书募集活动，得到社区孩子的积极响应。作为柯桥区民政局公益创投项目之一，该活动旨在实现闲置书籍的最佳利用，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的阅读习惯。

钟伟、沈潇 摄